

新
人
生
觀

羅家倫著

羅家倫著

新
人
生
觀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自序

浩蕩成江的鮮血，滂沱如雨的炸片，時代掀起的亙古未有之洪濤，能不使我們，站在存亡絕續關口的我們，對於整個的人生問題，有一度新的審察和領悟？

我們要生存，我們更要有意義的生存，所以我們那能不追求生存的意義，和達到這有意義的生存的方式？在這真實空時構成的創造的宇宙裏，我們的生命是動的，真實的，更是創造的。我們的思想不能開倒車。我們不能背着時代後退，我們也不能隨着時代前滾，我們要把握住時代的巨輪，有意識的推動他進向我們光輝的理想。

我們要揮着慧劍，割去陳腐。我們要廓清因循，頹廢，軟弱，倚賴，卑怯，和一切時代錯誤的思想——生命的毒菌。不但是打掃地方爲了培養新的肌肉，而且是期待長成新的骨幹。

這偉大的時代需要我們有力的思想，有力的行爲，有力的生命。

自從神聖抗戰發動以來，我就開始想做一點積極的思想工作。我寫這部新人生觀的時候，不想照傳統的寫法，分門別類的論列人生哲學的各部分。我祇想把中國民族思想和生命中，我認爲缺少或貧乏的部分，特別提出來探討，來發揮。但是寫成以後，也自成一個系統。

講人生哲學，要是使他理論的基礎穩固的話，不能不有他在玄學——形而上學——上的根據。這一點我那裏敢忽視。

這部書裏的十六章，本是我於中央大學西遷以後，對全校的一套系統演講。也曾在刊物上登載過幾篇。現在重新寫定，成爲專書。我斷不敢希冀前哲在圍城中講學的高風，但是這十六章卻章章都是講完和寫完在敵機威脅的期間，有時還在四周圍火光熊熊之中。

我斷不敢說這部書是表現一種有力的思想，我祇敢說這是我個人用過氣力去思想的一點結果。我是根據自己知道的深信，以充分的熱忱寫出來的，自然我也希望國人能得到同樣的深信。

這一件不是泛泛的禮物，敬以獻給有肩膀，有脊骨，有心胸，有眼光而有熱忱的中華兒女，尤其是青年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元旦，陪都重慶，羅家倫。

目錄

建立新人生觀.....	一
道德的勇氣.....	八
知識的責任.....	一四
弱是罪惡，強而不暴是美.....	二一
恢復唐以前形體美的標準.....	二七
挾出於偉大的同情.....	三二
榮譽與愛榮譽.....	三八
運動家的風度.....	四三
悲觀與樂觀.....	四九
扭開命定論與機械論的鎖鍊.....	五七
從完成責任到實現權利.....	六九
目的與手段.....	七七
創造與佔有.....	八三
學問與智慧.....	九三
文化的修養.....	九九
信仰，理想，熱忱.....	一〇五

新人生觀

建立新人生觀

建立新人生觀，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學。人生哲學在英文叫做“Philosophy of Life”，在德文則為“Lebensanschauung”，正是人生觀的意義。他是對於生命的一種透視（Insight），也可說是對於整個人生的一種灼見。人生的意義是什麼？我們應該做怎樣一種人？這些問題，我們今天不想到，明天不定會想到；一個月之內不想到一次，一年之內不定會想到一次。想到而不能解答，便是人生的大危機。若是永不想到的人，這真是醉生夢死，虛度一生的糊塗蟲了。想到而要求適當的解決，那就非研究人生哲學不可。我們本是先有人生而後有的人生哲學，正如先有飲食而後纔有醫學裏的營養學。但是既有的人生哲學以後，人生就免不了受他的影響。也祇有了解人生哲學的人，對於人生纔覺得更有意義，更有把握，更有前途。不但學社會科學的人應當了解，學自然科學的人也應當了解；廣義的說，凡是做的人都應該了解。普通種田的農夫，尙且根據傳下來的經驗，有所謂拇指律（Rule of the thumb），爲一生做人的準則，何況知識與理性都已發展到高度的青年？

在現時代，人生哲學更有他重要的意義和使命。因爲在這時代，舊道德標準都已動搖，而新的道德標準尙未確立，一般青年都覺得徬徨，都覺得迷惑，往往進退失據，而陷於煩悶與苦惱的深淵。在中國有此情形，在外國也是一樣。外國從前靠宗教信仰維繫人心。現在宗教信仰已經動搖。而新的信仰中心也未樹立，在青黃不接的時代，更顯出許多迷路的羔羊。讀李勃曼（Walter Lippmann）道德序言（“Preface of Morals”）一書，知中外均有同感。因此在這個時代更有應重新估定生命的價值表，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學之必要；否則長久在煩悶苦惱之中，情緒日漸萎縮，意志日漸頹唐，生活自然也日漸低落。茅盾所著三部曲，一曰動搖，二曰追求，三

曰幻滅。這三個名詞，很足形容這時代青年心理的動向和慘態。現在舊的已經動搖了，大家拚命去追求新的，如果追求不到，其結果必歸幻滅。幻滅是何等淒慘的事！有思想責任的人，對於這種爲『生民立命』的工作，能夠袖手旁觀嗎？

要建立新的人生哲學，首先要明白他與舊的人生哲學，在態度上至少有三種不同。有了不同的態度，纔能對於新的生命價值表加以估定。

首先要認定的是新的人生哲學不是專講『應該』(Ought)，而是要講『不行』(Cannot)。舊的人生哲學常以爲一切道德的標準，都是先天的疇範，人生祇應該填塞進去。新的人生哲學則不持先天疇範之說，而祇認爲這是事實的需要，經驗的結晶。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較空，成不成，要得要不得的問題更切。譬如拿文法的定律來說，本不是先有文法而後有文字，文法祇是從文字歸納出來的。文法的定律並不要逼人去遵守他，但是你如果不遵守他，你就不能表白意思，使人了解。你自己用文字來達意表情的目的，竟由你自己打消。所以這是不成的，就是要不得的，也就是所謂『不行』的。

其次新的人生哲學不專恃權威(Authority)或傳統(Tradition)，乃要以理智來審察現實的要求和生存的條件。權威和傳統並不是都要不得，祇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。我們要以理智和經驗去審察他，看他合於現代生命的願望，目的，以及求生的動態與否。這不是抹煞舊的，而是要重新審定舊的，解釋舊的。舊的是歷史，歷史是潛伏在每人的生命細胞之內，不但不能抹煞，而且想丟也是丟不掉的；但是生命之流前進了，每個時間的階段都有他的特質。鏽鏽過去，使他成爲活動的過去，爲新生命中的一部分，纔能適合並提高現實生存的要求。

還有一層，新的人生哲學不專講良心良知，而講整個人生及其性格風度的養成，並從經歷和習慣中樹立其理想的生活。他和舊的一樣，專從良心良知中去求判別是非的標準，以『明心見性』去達到佛家所謂『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』的地步。他更不是建築在個人的幻想，衝動，或慾望上面。他要從民族人類的歷史中，

尋出人與人的關係，以決定個人所應該養成的性格和風度。他是要從個人高尚生命的實現中，去增進整個的社會生活與人類幸福。覺得如此。方不落空。

新的人生哲學根據這三種的態度以重定生命的價值表，以建立新的人生觀。他並不否認舊的一切價值，乃是加以必要的改變而已。他把舊的價值，重新估計以後，成爲新的價值標準，以求人生的實現，更豐富和美麗的實現。這纔是真正『價值的轉格』(‘die Umwertung aller Werte’)。

我們不只是要求人生更豐富更美麗的實現，我們還要把人生提高。平庸的生活，是不值得活的。我們要運用我們的生力，朝着我們的理想，不但使我們的生命格外的崇高偉大，莊嚴壯麗，而且要以我們的生命來領導，帶起一般的人，使他們的生命也格外的崇高偉大，莊嚴壯麗，所以我們要根據新的人生哲學態度，建立三種新的人生觀：

第一是動的人生觀 宇宙是動的，是進行不息的；人生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所以也是動的，進行不息的。希臘哲學家海瑞克萊圖斯 (Heraclitus) 說：『你不能兩次站在同一個河裏』。孔子在川上說：『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，』都是這個道理。何況近代物理學家更告訴我們電子無時無刻不在震盪的道理。人生在宇宙中間，還能夠停止，不運用自己的生力去適應宇宙的動嗎？不能如此，便是『賊天之性』。何況人羣的競爭，異常劇烈，你不動，他人動，你就落伍。落伍是生命的悲劇。中國受宋儒『主靜主敬』學說的流毒太深了。這種學說裏面，本來含着一部分印度佛教的成分，是與孔墨力行的宗旨違背的。我們要把靜的人生觀摔得粉碎，重新建立動的人生觀來。

第二是創造的人生觀 我所謂動，不是盲動，是有目的的動，有意識的動。是前進的動，不是後退的動。這就是我們創造性的發揮。我們不祇是憑自力創造，而且要運用自力，以發動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來創造。譬如宇宙間無窮的電力，我們以智慧來驅使他發光發熱，供一切人生的需要，這個就叫創造的智慧。人類之有今日，是歷代先哲創造的智慧所積成的。我們不能發揮創造的智慧，不但對不起自己的人生，而且對不起先哲心

血積成的遺留。保守成功嗎？保守就是消耗，衰落，停滯，腐爛與毀滅。又如前代的美術創造品，是有偉大的，特出的。設如你不把他吸收孕育到自己的創造的智慧裏去，再來努力創造，而專門寶藏舊的，那不但舊的不能成爲新人生的一部分，（我們至多不過享受而已，）而且新的偉大的美術作品永遠不會出來。保守的方法無論如何好，舊的因爲時間的剝蝕，總有銷毀的一天。縱不銷毀，那偉大的創作，終久是前人的創作，前時代的創作，有限的創作，而不是本人的創作，現時代的創作，無限的創作。我們不但要『繼往』。更加要『開來』！

第三是我的人生觀 我們不要看得人生太小了，太窄了。太小太窄的人生是發揮不出來的。他一定像沒有雨露的花苞，不但開不出來，而且一定萎落，一定殞死。我們所以有現在，是多少人的汗心血培植成的。就物質而言，則我們吃的穿的住的，那一件不是農夫工人商人工程師發明家這一般廣大的人羣所貢獻。就精神的糧食而言，那一項偉大崇高的哲學思想，美麗諧和的音樂美術，心動神移的文學作品，透關忠誠的歷史紀載，凡是涵煦覆育着我們心靈生活的，不是哲人傑士的遺留。我們負於大社會的債務太多了。祇有藉他們方能充實形成小我。反過來也祇有極力發揮小我，擴充小我，纔能實現大我。爲小我而生存，這生存太無光輝太無興趣，太無意識。必須小我與大我合而爲一，纔能領會到生存的意義。必須將小我來提高大我，推進大我，人羣纔能向上，不然小我也不過是洪流巨浸中的一個小小水泡，還有什麼價值？這就是大我人生觀的意義！

人生觀不是空懸，是要藉生活來實現的。不是身體力行，斷不能領會這種人生觀的意味，維持他的崇高。所以要實現這三個基本的人生觀，必要靠以下三種的生活方式。

第一是力的生活 宇宙沒有力如何存在？人生沒有力如何生存？萎靡柔懦是人生的大敵。力是生機的表現，是自強不息的活動，是一種向上的慾望。你願意人叫你軟骨動物嗎？做人不但要有物質的力，而且要有精神的力。不但行爲要有力，而且思想也要有力。有力方纔站得住，行得開。科學的好處就在不但能利用自己的

力，而且能利用宇宙的力。我們對宇宙的力要能儲蓄待用，對自己的力也要儲蓄待用。不要輕易的發洩，還要留作偉大的發揮。我們不要忘了，生命就是不斷向上向外向前的努力。

第二是意志的生活 在這沈迷淪陷於物質生活的人羣中，有幾人能實行意志的生活，能領會這種生活的樂趣？不說超人，恐怕要等那特立獨行的人罷！非是堅苦卓絕的人，怎配過意志的生活？因為這生活不是肉感的，不是享受的，生命的擴大，那能不受障礙，障礙就是意志的試驗。意志薄弱的見了困難就逃了，祇有意志堅強的人纔能運用『力』征服過去。經過痛苦是常事。祇有痛苦以後得的甜蜜，纔是真有興趣的甜蜜。但是平庸的人能了解嗎？意志堅強的人，絕對不怕毀滅，而且自己能夠毀滅，毀滅以後，自己更能有偉大的創造，所以戰爭是意志的試金石。我常論戰爭說，開戰以前計較的是利害的輕重，開戰以後計較的是意志的強弱。這就是勝負的關鍵！不但是有形的軍隊戰爭如此，一切生存的戰爭，也是如此。平庸的，退卻的，失敗的鎖鍊，祇有堅強的意志纔能扭開。

第三是強者的生活 能憑藉意志去運用力量以征服困難的生活。非強者的生活而何？我所謂強，是強而不暴的強，是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』的強。強的對面是弱。搖尾乞憐，自己認為不行，便是弱者的象徵。強者的象徵就是能在危險中過生活。他不但不怕危險，而且樂於接受危險。他知道戰爭是不能躲避的，所以歡樂的高歌而上戰場。他的道德信條是強健，勇猛，無畏，正直，威嚴，心胸廣大，精神奮發。他最鄙視的是軟弱，柔靡，恐懼，倚賴，狹小，欺騙，無恥。他因為樂於危險的生活，所以他不求安全。古人說『磐石之安』，但是磐石不是有生命的。無生命的生活，過一萬年有甚麼意思？況且求安全是不可能的事。安全由於平衡，生命那有固定的平衡，因為你發展，人家也發展，祇有以你自己的發展，來均衡人家的發展，纔能得比較的安全。能夠如此，纔能操之在我。所以他永遠是主人，不是奴隸。

我上面說過這三種生活，都是要靠身體力行的。前人說『書生誤國總空談』，空談不但誤國，也是誤己。坐談何如起行！生命是進取的，不是等候的。生命是挾着時間前進的，時間那容等候？柏格森說得好：『對於

一個有意識的生命，生就是變，變就是成熟，成熟就是不斷的創造自己。」所以我們要趕着每一個變動，增加自己生存的力量。

要創造一個新的生命，新的秩序，必須要先創造一個新的風氣，這就要靠開風氣之先和轉移一世風氣的人。社會的演進，本不是靠多數沉溺於現在的瀟灑的人去振拔的，而是靠少數特立獨行出類拔萃的人去超度的。後一種的人對於這種遺大投艱的工作，不祇是要用思想去領導，而且要以實行的榜樣去領導。看過歷史，都是這樣，所以孔墨都是力行的先哲。明季的顏習齋李恕合一般人更主張極端的力行。就拿近代的曾國藩來說，他對清廷來平太平天國，我們並不贊成；但是當吏偷民情，政治社會腐敗達於極點的時候，能轉移一時風氣，化亂世而致小康，實在有人所難能的地方。他批評當時的吏治是「大率以畏葸為慎，以萎靡為恭。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，曰畏縮，曰瑣屑；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，曰敷衍，曰顛預。」所以當時到了「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」的局面。他論當時的軍事，引鄭公子突的話，說是「勝不相讓，敗不相救，輕而不整，貪而不親。」他感慨當時的世道人心是「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，唯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……殊堪浩歎。」他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，以為是一個很謹愿的人，反之他是一個很聰明而很有才氣的人，不過他硬把他的聰明才氣內斂，成爲一種堅韌的毅力，而表面看過去像是一個忠厚長者。他憑藉羅澤南在湖南講學的一個底子，又憑自己躬行實踐號召的力量，結合一班湖南的書生，居然能轉移風氣，克定大難，爲滿清延長了幾十年生命。（他轉移軍隊風氣的一個例，很值得注意。他不是說當時軍隊「敗不相救」嗎？他以「千里相救」爲湘軍「家法」，所以常常打勝仗。）一個曾國藩在專制政體的舊觀念之下，還能以躬行實踐，號召一時，何況我們具有新的哲學深信，當着這國家民族生存戰爭的重大關頭？

在這偉大的時代，也是顛播最劇烈的時代，確定新的人生觀，實現新的生活方式，是最迫切而重要的事。方東美先生說「中國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難，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，培養溥博沉雄的情緒，促我們振作精神，努力提高品德，他們抵死推敲生命意義，確定生命價值，使我們腳跟站得住。」當拿破崙戰爭時代，德國

的哲學家菲希特 (Fichte) 講學發表告德意志民族一書，也是這個意思。現在有如孤舟在大海一樣，雖然黑雲四布，風浪掀天，船身搖動，船上的人衣服透濕，痛苦不堪，祇要我們在舵樓上脚跟站穩，望着前面燈塔的光明，沉着的英勇的鼓着時代的巨輪前進，終能平安的扁舟穩渡。這一點小小的惡作劇，不過是大海航程中應有的風波！

道德的勇氣

要建立新人生觀，第一必須養成道德的勇氣 (Moral courage)。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 (Bravery) 有區別的。通常所謂勇不免偏重體力的勇，或是血氣的勇；而道德的勇氣，乃是人生精神最好的表現。『匹夫之勇』與『好勇鬪狠』的勇，那能相提並論？

什麼是道德的勇氣？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，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。第一，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。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，不是理智的；是一時的，不是持久的。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，審慎的計劃，所以不免『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』他的表現是暴烈 (Violence)，暴烈是與堅毅 (Tenacity) 成反比例的。暴烈愈甚，堅毅愈差。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，歷歷不爽。第二，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。虛矯的人，決不能成大事。所謂『舉趾高，心不固矣。』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，我們所要的是『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。』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，決不輕易接受，而一經接受，就要咬緊牙根，以全力幹到底。他所有的勇氣，都是經內心鍛鍊過的力量，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。舉一例來說明罷。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得菲亞 (Philadelphia) 城，看一齣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 (John Drinkwater) 的歷史名劇，叫做林肯 ("Abraham Lincoln")。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，該黨代表團來見他，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，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。他聽到這個消息，沈默半晌，方纔答應。等代表團走了以後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。看了許久，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。我看完以後，非常感動，回到寄住的人家來，半夜不能睡覺。心裏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能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，豈不要眉飛色舞，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？中國名劇牡丹亭中，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，口裏唸道：『先師孔夫子，猶未見周王，老夫陳最良，得見聖天子，豈偶然哉！豈偶然哉！』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。但是林肯知道這可以當選為大總統的時候，就感覺到國

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的雙肩上了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。凝視國家的地圖，繼之以跪下來祈禱。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！

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鍛鍊纔會養成的。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，必定要有兩個先決條件：第一是天性的敦厚，第二是體魄的雄健。就第一個條件說，一個人有無作爲，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。不要說看人能否擔當國家大事，就是我們結交朋友，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，纔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。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，是決不會對於朋友篤厚忠誠的。自然這樣的人，也決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，特別愛戴的，所以古來許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標準，是寧取笨重，而不取小巧。倒是鄉間的農夫，看來雖似愚笨，卻很淳樸誠懇，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。祇有那戴尖頂小帽，口齒伶俐，舉動漂亮的人，雖然一時討人歡喜，卻除了做『小官僚』，做『洋行小鬼』而外，別無可靠之處。就第二個條件說，則體力與膽量關係，實在密切極了。二者之間，繫數極大。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；體力差的人，卻常常易於膽子小。一遇危難，倉皇失措，往往是體力虛弱，不能支持的結果。左傳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，是『張脈奮興，陰血周作，進退不可，周旋不能』，所以把戰事弄糟了，騎在上面的國王，也就誤在這馬的身上。馬猶如此，人豈不然。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，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。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他了嗎？

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，然後纔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。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鍊。孟子所謂『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』，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。從這種修養鍛鍊之中，纔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『浩然之氣』，一種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，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』的從容態度；修養到了這個地步，道德的勇氣纔可以說是完成。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，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？

(一)知識的陶鑄 真正道德的勇氣，是從知識裏面產生出來的，因為經過知識的磨鍊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，纔是有意識的，而不是專恃直覺的。固然『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』，但這還是指本性的，直覺的方面

而言。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裏，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鎔，纔能真正辨別是非，纔能樹立『知識的深信』(Intellectual conviction)。知識的深信，是一切勇氣的來源，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，才能發爲有系統，有計劃，有遠見的行動。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，祇是他把打算盤看透了！

(一)生活的素養 僅有知識的陶鎔還不夠，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。西洋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("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")聯在一起說，實在很有道理。沒有簡單的生活，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。社會上有些壞人，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，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，一時降不下來，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虧。那佔有慾(Possessive instinct)的作祟，更是一個重大原因。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，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。兩個人說好了。一個正要辭別回家，這位主人送客出門，客還沒有走，就問自己的用人喂了豬沒有。那位客人聽了，就長歎一聲，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。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而肯自己殉國之理。後來果然如此。中國還有一個故事，說一個貪官死去，閻王審問他的時候說：『你太貪了，來生罰你變狗。』他求閻王道：『求閻王罰我變母狗，不要變公狗。』閻王說：『你這人真沒有出息，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』他說：『我是讀過禮記的。禮記上說：臨財母狗得，臨難母狗免，所以我變母狗。』原來他把原文的『毋苟』二字讀『母狗』，以爲既可得財，又可免難。這雖是一個笑話，卻是對於『心有所蔽』而不能抑制佔有慾者一個最好形容。須知一個人的行動，必須心無所蔽，然後在最後關頭，方可發揮他的偉大。這種偉大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。

(二)意志的鍛鍊 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(Life of senses)，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的生活，而不是意志的生活(Life of will)。意志的生活，是另一種境界，祇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。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，堅韌不拔的操行，所以『舉世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毀之而不加沮。』他有『雖千萬人吾往矣』的氣概，所以悠悠之口，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。他能以最大的決心，去貫徹他的主張。他是『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』的；他不但『不挾長，不挾貴』，而在這個年頭，更能不挾羣衆，而且也不爲羣衆所挾。他是堅強的。

不是脆弱的。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難，而他的精神愈奮發，意志愈堅強，體力愈充盈，生活愈緊張。凡是脆弱的人，最後都是要失敗的。辛亥革命的時候，民立報的一位編輯徐血兒，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做了七血篇，慷慨激昂，風動一時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，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爲了，終日花天酒地，吐血而死，成爲真正的『血兒』。這就是意志薄弱，缺乏修養的結果。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。他辛辛苦苦，接連幹了十幾年。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要自殺兩次，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，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，纔有辦法，所以決不灰心，繼續幹下去。等到他做到了『朝』的功夫，他纔有成就。

(四) 臨危的訓練 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，祇有到臨危的時候，纔容易表現出來。世界上那一個偉大的人物，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，不爲所屈，而後能夠產生的？俗語說『老和尚成佛，要千修百鍊』。修鍊的時候，是很苦的。時而水火，時而刀兵，時而美女，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，引誘他。要他不爲所屈，不爲所動，而後可以成佛。這種傳說，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。從前全國人對於委員長蔣先生還不能有深刻的認識，等到西安事變發生，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當中，依然保持他的尊嚴與氣度，然後大家纔都能真正認識他，信仰他，崇拜他。甚至連反對他的人都受了感動，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了。因爲在這樣九死一生的危險時機，他的偉大的人格和精神，都充分的表現出來。中國人常說：『慷慨成仁易，從容就義難』。張陞陽臨刑前說：『南八，男兒死耳，不爲不義屈』。這種臨危的精神，是不因爲他死而毀滅的。黃黎洲先生在他的補歷代史表序上他一段文章說：『元之亡也，危素趨報恩寺，將入井中。僧大梓云，「國史非公莫知，公死是死國之史也。」素是以不死。後修元史，不開素有一詞之贊。及明之亡，朝之任史事者衆矣，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，不亦可慨也夫！』這段沉痛的文字，豈僅指危素而言，也同時是爲錢謙益輩而發。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，必定是怯者，是懦夫。祇有強者纔不怕危險，不但怕危險，而且愛危險，因爲在危險當中，纔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。

中國歷史上，有不少偉大的人物，如文天祥、史可法等，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。十年以前，我和

蔣先生閑談。我說，我們在開國的時候，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，和文天祥史可法諸位呢？蔣先生沈默了一會，他說：『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，其百折不回，從容就義的精神，真是偉大！』我想文天祥的人格，行為，及其留下的教訓，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。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，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，纔帶新兵二萬入衛，元朝伯顏丞相兵薄臨安，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『講解』。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。他的隨從義士杜澗等設計使他逃出，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，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，幾乎性命不保，逃至揚州，旋逃通州。路遇伏兵，饑餓不能走了；杜澗等募兩個樵夫，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。航海到溫州起兵；轉到汀州、漳州，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復江西。漢奸吳浚來說降他，他把吳浚殺了。江西的會昌、零都、興國、撫州、吉安，和廬陵的東固鎮都有他的戰績。他的聲勢，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。兵敗了，妻子都失陷了，他又重新逃回到汀洲，再在閩粵之間起兵；又由海豐，南嶽打出來，在五坡嶺被執。自殺不死，路過廬陵家鄉絕食不死；解到燕京，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，說降他，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，他總是不屈，要求元朝殺他。若是不殺他，他逃出來，還是要起兵的。元朝也爲這個理由，把他殺了。他在獄中除作了正氣歌之外，還集杜詩二百首，這是何等的鎮靜！何等的從容！他就刑時候的『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』幾句話，不獨留下千秋萬世的光鑑，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『道德的勇氣』的充分表現。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，經國難舉兵以後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。他的行為，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。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決不灰心。當然他是文人，兵又是烏合之衆的義兵，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。但是常打勝仗，間有失敗而不灰心還容易；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，實在更困難。這是『知其不可而爲之』的精神。第二是他常逃，他逃了好幾次；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，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。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，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？做事祇要是對的，成敗有什麼關係？『若夫成功則天也』，也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。文天祥出來太晚了！文天祥太少了！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，元朝豈能亡宋？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，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！